

狂草书法的形式感与人格的铸造

——张旭、怀素及“毛体”书法的异同研究

文/廖文斌

(广西师范学院艺术系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书法是中国上下五千年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它与中国文化相表里，与中华民族精神成一体，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是世界艺术之林的奇葩。在中国书法史上，涌现出许许多多的书法大家。其中，张旭、怀素、毛泽东是佼佼者之一。本文将其代表作进行书法艺术上的对比，深入探讨他们书法艺术的异同，目的就是提高大、中小学生以及普通群众对书法艺术的欣赏水平和对人生的感悟。

【关键词】书法 内涵 比较 感悟

书法是我国独特的传统艺术，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欣赏和喜爱。是因为她是以汉字为载体，涉及语言、文学、历史、美学等方面，又与音乐、美术相通，能示人以美，触发人们对美的感受和联想，它是审美与实用的结合体。汉代的杨雄曾说过：“字为心画”，即书法是表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鲁迅先生说：“我国的书法艺术是东方的明珠瑰宝，它不是诗却有诗的韵味，它不是画却有画的美感，它不是舞却有舞的节奏，它不是歌却有歌的旋律。”还说：“我国文字有三美，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难怪乎世界著名的艺术大师毕加索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书法文化感慨万千的讲：“如果我生在中国，不会是位画家，但肯定是位书法家。”所以说，美的书法能通过形象而又抽象的线条使欣赏者获得美的享受，并能够陶冶人格和性情。而且，随着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追求高质量的生活，许多人喜欢在家中挂一幅书画作品以增点书香，这不仅是装饰，也体现个人的品味，同时更是一种美的享受。对于大、中小学生来说，把他们带到书法美的意境中去，让他们耳濡目染，深受熏陶，则必定会有全新的发现，久而久之，也就会有闪光的自我，这些在电脑中是不能显现出来的。事实也证明，学习书法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接受书法教育的学生能获得一种极强的协调和自控能力，为学习其他学科，培养其它技能打下一个良好基础。

为此，每当我们踏进中小学校、翻开中小学校的课本或在公共场所时，总会出现你眼帘的书法作品是毛泽东主席题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或“为人民服务”等标语。而毛泽东是一位公认的一代伟人，他集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思想家、诗人和艺术家于一身。他的书法艺术雄奇瑰丽，特别是狂草书作，独辟蹊径，别树一帜，世称“毛体”。若将其代表作与历史上的大草书家张旭、怀素的书法艺术相比，深入探讨他们书法艺术的特征和影响，对于大、中小学生以及广大人们群众认识书法艺术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精神性的异同

精神性是艺术品的价值所在，而精神性又不能只局限于艺术家个性的精神性，它必须融汇到更加宏大的背景之中。就毛泽东和张旭、怀素的书法而言，其精神性正是个体精神和时代精神相融汇生发的集束展现。这种精神性已接近人性的深层，因为他们进入了一种没有任何障碍，超越了一切实用的功能；进入了完全内心自由的情绪，是内心深层的发挥。对比毛泽东、张旭、怀素书法艺术，我认为他们的这种表达方式接近了书法艺术的本质，接近了艺术的精神。但张旭、怀素他们的表现和表达还不够，没完全进入对内心深层的挖掘。因为张旭、怀素他们还是受到当时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受到整个书法大文化环境的影响，尚不是完全的视觉艺术。我们看张旭、怀素的许多狂草作品时，会发现他们那种严密的技术系统，几乎没有产生过漏洞、残缺和空间，没有给别人留下想象，这样的艺术非常精致、完美。但精致的艺术往往偏离了艺术的本真，我始终认为，它有某种隔阂、间

隙在里面。虽然艺术家须追求技术上的完善表达，希望自己的作品非常到位、精致。但往往艺术“进入非常完美、精致的日报，它感人的、耀眼的东西就丢失了。”这里面有个度的问题。艺术最重要的应当不仅仅只是带给人以愉悦、精美，或者安慰。艺术更重要的是带给人以启示、思索：一种心灵的默契、一种新感受、全新的图释。也就是给人以想象的余地与空间，只有如此，才能引导人的审美前行。毛泽东的书法艺术就是这样一个好的典型例子，他之所以“一笔擎天”，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生来就有的，这是他哲学观念、思维方式、思想境界的展现；也是他的人生情致、审美情趣和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他青少年就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因而博览群书，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先后研习《兰亭序》、晋唐小楷，并抄写《三字经》、《论语》、《诗经》、《汉书》等，从中吸取了我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之营养，也打下了扎实的书法功底。他在长征途中创作的《娄山关》时，由于主体精神强烈，故运笔大胆肯定，直抒胸臆，毫无阻滞，走笔连绵，奔腾如电，大有高迈健拔之韵，深沉刚直之情，坚不可破之质，浩然行空之势。60年代，雷锋的思想、风格、斗志，感动和鼓舞了亿万群众，也深深打动了毛泽东。为了弘扬雷锋精神，它采用了行草书体题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字体流畅，运笔巧妙，法字新颖，形神兼备，顾盼有情，字字千钧，美若画卷，沁人心脾，挥洒了一曲美德和弦。

二、视觉性的异同

如果说精神性让“毛体”书法与张旭书法的内在充盈结实，那么，视觉性则打造出“毛体”书法与张旭书法外在的夺目光华。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一幅好的书法作品，最具生命力的就是线条，它是构成字形的的基础。任何一幅书法作品，如果分析其中多个字的每条线段，都是静止的；但书法家却能在创作过程中，用笔的轨迹，把静止的线条演变成运动的字形。由此可见，书法的生命是线的节奏，它主要通过线的起承转合、干湿粗细，以及字体的大小变化来感受的，我们称之为“视觉节奏”。这种书法特性在草书中显得最为突出。比如张旭的狂草，其超妙入神的草书，龙飞凤舞，神妙莫测，腾芳飞彩，曲线连着曲线，初观狼藉，细察却无一笔不合规矩，其形态的变化，最易使人联想到仙女舞影的婀娜多姿，并将其拟人化，而给人以急雨旋风式的视觉的美。由此，艺术界把他和怀素并称为“颠张狂素”。他的书法得之于“二王”而又能独创新意。他的楷书端正谨严，规矩至极，黄山谷誉为“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若说他的楷书是继承多于创造，那么他的草书则是书法上了不起的创新与发展了。韩愈说：“旭善草书，不治他技故旭之书，变动如鬼神，不可端倪。”，杜甫在《八仙歌》中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他能把书法艺术升华到了用抽象的点线去表现书法家思想情感高度的艺术境界。在书法艺术中，他的字貌似怪而不怪，关键在于点画用笔完全符合传统规矩。可以说，他是用传统

技法表现自己的个性，他用传统的点线符号以新的生命，他用流动而富于变化的笔墨以视觉的冲击力，在书法上成就了有创造力的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书法家。博大清新，纵逸豪放之处，远远超过了前代书法家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盛唐气象。

在书法艺术中，把线条划分为四种基本规律，分别是基本律、回护律、起伏律和间隔律。前两种偏向于单线条的节奏构成，而后两种则重于结构、章法的连贯。“草圣”张旭、怀素以及伟人毛泽东的书作，线条峰回路转、飘忽不定、行云流水的视觉性无人能比，特别是后者把“四律”的线节奏、结构与章法推上了狂草艺术的最高峰。毛泽东在40年代末佳作迭出，如《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和柳亚子先生》等，这些作品以行草为主，杂以楷行，字体大小变化丰富，或笔墨沉实，或飘逸洒脱，锋芒毕露，其主笔更是时常夸大逸出，出人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此时，“毛体”风格基本形成。60年代，他倾情于张旭和怀素的狂草艺术，可又不受其羁绊，而是贵质、遗采、取神，放手写意。看其书法作品，刚柔相济，高屋建瓴，字字摄人眼魂，登上了狂草书法艺术的最高峰。（相关图片见封三）

三、独特（技术）性的异同

康德说：“艺术的最高成果是风格”。张旭、怀素和毛泽东的狂草书法就是以独特的艺术风格，震撼整个书坛和亿万群众，欣赏吟咏者有之，争相摩习者有之，潜心研究者有之。可以这么说，没有“毛体”书法与张旭书法各自的独特（技术）性，就没有“毛体”书法与张旭书法的视觉性，也无以充分发露他们的精神性。

苏东坡在《书论诗》中说：“兴来一挥百纸就，骏马倏忽踏九州，我书本意无造法，点画顺手烦推求。”这段名句是对超凡脱俗书法大家的歌颂。毛泽东正其人也，他的狂草书法艺术别具一格，字体大小相辉映，小中见大，气象万千，壮美狂澜，如《六盘山》中，从“天高云淡”到“屈”字一气直下，紧接着“指行程二”四个字骤小，从最强音降低8到6度。往下看，结束上阙的“万”字特别的大，以下留下大片空白之后，与款、题名等小字遥相呼应，取得了浑然一体的效果，作品中的用笔取张旭、怀素之长，即中锋使毫，用笔快捷迅猛，如疾风迅雷，扑面而来，有万夫莫当之气势。其线条虽然细瘦，却蕴涵劲力，如强弓力挽，势在即发。其章法特点是纵向取势，左右穿插，似两军对垒，相互厮杀；又如担夫争路，左闪右让。有时一字甚至于被压缩成一点，有时一个字却又占据了几个字的空间，真可谓是用笔大胆、落墨泼辣。欣赏此作，不难想象“飘风急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的意境，创造出了波澜壮观之美。此外，毛泽东的书作尺幅都不大，但不管如何放大，或悬于门厅、礼堂，还是雕刻于广场，都显得大气、雄健、形神完美，如雕刻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笔笔含情，字字神武，道劲多姿，庄严巍峨。（相关图片见封三）

四、实用及审美共融性

当代书论家金学智在《书法美学谈》中对书法的表现功能作了精彩的描述：“象形文字的非象形化，不是削弱了书法的美，而是解放了书法的美，促进了书法艺术从另一途径来‘学之于造化’，在更广大的天地里‘博采众美’以滋润自己，丰富自己的形象感和表现力。”可见，书法艺术的最主要的美学特征，是在空间里通过汉字的表现、线条的挥运进行抒情表意。

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来传情达意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的，以往它的实用性和文化作用似乎大于它的艺术性。二十世纪的中国书法与其既往历史的根本性区别，是从“美用合一”走向“美用分离”。在古代，书法是知识者不可或缺的人文教养，以其日常应用性与文化人格标志的耦合功能，实现着最大程度的

社会化。我们知道，书法之草书形成于汉代，是为书写简便在隶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章草笔划变化有章法可循，代表作如三国《急就章》。今草不拘章法，笔势流畅。狂草出现于唐代，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笔势狂放不羁，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比较这两大家书法艺术特征来看，笔势方面，张旭比怀素更加沉稳，成熟，性情比怀素更加粗放；笔意方面，怀素更加轻盈精致，秀气感十足，美到极点。由于张旭、怀素的书法已经走向“美用分离”更高的纯艺术道路，因此其书作实用性弱，而艺术性强，大众化和普及性就相对的差些，在社会上懂得欣赏的为数不是很多。

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柱擎天”，在书法史上是“一笔擎天”。他一直强调艺术必须为大众服务，书写的形式必须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既让人们看懂内容，又能欣赏书法的美。因此，毛泽东题字大都采用行楷和行草书体，如“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等具有广博影响的书作。这些书法佳作充分体现了书法的实用性与审美的共融性。（相关图片见封三）

五、结束语

综观古今，凡成大业者大多都能继承和发扬我国书法这一传统文化，并良好的人格品质。比如，唐太宗是重视书法、且善书法的第一帝君，因而书法在唐代最为辉煌，涌现了像张旭、怀素的书法大家。毛泽东诗纵草狂，为世人所景仰，让诗人书家共折腰。

目前，中国的家庭多为独生子女，他们中的一部分生活自理能力差，性格比较孤僻。学习、练习书法则是调节心理素质、规范行为的好办法，可以使学生进入相对静止状态。现在的学生不是不聪明，而是太马虎，不认真，不专心。而练字必须全身心的投入，必须心静气和，端正姿势，持之以恒，久而久之就可养成严谨认真的好习惯。同时，学生最缺少的是韧劲与耐力，也恰好可通过一笔一画的书写练习来获得，纠正草草了事、粗枝大叶、马虎的毛病，从而养成锲而不舍、精力专注、耐心细致、不怕困难的好习惯。

参考书目

- 1、陈振濂《书法美学》
- 2、金学智《书法美学谈》

作者简介

廖文斌，广西艺术学院美术系本科毕业，山东文化艺术研究院美术理论研究生班结业，现是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中国书画研究院艺术委员会委员、广西师范学院艺术系美术专业教师和山东文化艺术研究院美术创作研究员。

